

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研究丛书

刘新成 主编



刘文明
著

全球史理论与 与文明互动研究

Research on Global History Theory and Intercivilizational Interaction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研究丛书

刘新成 主编



全球史理论与 与文明互动研究

Research on Global History Theory and Intercivilizational Interactions

刘文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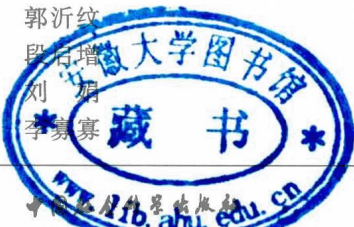
全球史理论与文明互动研究 / 刘文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 - 7 - 5161 - 5577 - 6

I. ①全… II. ①刘… III. ①世界史—研究 IV. 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253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沂纹
责任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段后增
责任校对 刘娟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0.25
插页 2
字数 340 千字
定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刘新成

当前，受全球化、“文明冲突”以及国际争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世界、文明和民族国家三者关系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联合国将2001年定为“文明对话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发布了“保护文化多样性宣言”。文明对话也好，保护文化多样性也好，其实都指向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异同关系”问题：世界同一，而文明和国家各异，因此必须处理好“异”和“同”的关系。

西方的“异同观”曾颇为“直白”：以异化同，亦即以西方文明同化世界，这与西方传统有关。西方自古典时代起就自视甚高，自称文明民族的同时，将毗邻的波斯人和日耳曼人等称为野蛮人。柏拉图设计的国家体制号称体现“普遍理想”，罗马法则以标志“人类共识”的“自然法”冠名。基督教取代犹太教也具有用普世宗教替代民族宗教的性质。中世纪教会宣称，世间全部生命毫无例外地服从上帝意志，（信仰）异端即属异类。宗教改革后，西方新兴阶级又恃其财富自称“上帝的选民”，睥睨所有“现世生活中的失败者”。1548年西班牙人胡安·金斯·德·塞普尔维达写到，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西方人的海外征服完全正义，因为在非正义君主统治下的印第安人并非完整意义上的人类，欧洲人是来解放他们的。在这些人看来，欧洲的海外扩张乃勉为其难的“白人负担”。启蒙运动后，宗教说教不再有市场，取而代之的是理性主义进步观和目的论，西方发展道路被说成人类发展必由之路，非西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不再是类别之分，而是发展水平的差距，不仅西方对世界的同化理所当然，而且非西方文明的唯一出路就是向西方靠拢。总之，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言，长期的唯我独尊加上近代以来视简化为美德的科学思维习惯，已经把西方导向“政治学摩尼教陷阱”，在他们眼中，世界永远是“我方”与“对方”

对峙的世界。时至今日，虽然许多西方人对“西方中心论”已经有所警觉，但传统思维方式仍然存在，仅从近年出版的中译西著《国富国穷》（〔美〕戴维·S·兰德斯，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和《文明》（〔英〕尼尔·弗格森，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等书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在非西方世界，尽管如中国等有古代文明传统的国家在历史上不乏“求同存异”“同无妨异”“异不害同”等思想，但这些思想一般仅就本族内部而言，与营造“世界秩序”没有多大关系。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以这样的态度“看世界”。他们与世界“碰撞”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与被西方侵略的屈辱史连在一起的，他们从一开始认识世界，就陷于承认劣势又不甘于劣势，反感西方又不得不学习西方的矛盾之中，“体用心态”并非中国专利。从中国的“师夷制夷”到日本的“西方技术加日本精神”，从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教到俄罗斯的民粹派，从沙特君主“要现代化，不要西化”的主张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兴起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尽管语言不同，说法各异，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或运动后果也不尽一致，但都表达了一种二元对立的“世界定式”：在这个定式的一边是本土，另一边是西方。本土一方最初可能是某种文明，但随着时代进展越来越多指向民族国家。

有言道“读史使人明智”，但殊不知历史学本身也是时代的产物，受时代局限的史学有时非但不能使人明智，反而会制造认识误区。西方的世界史学就曾经起过误导作用。西方“现代历史科学”源于19世纪末的兰克学派。当时的欧洲民族主义盛行，唯心史观大行其道。黑格尔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理性发展史，但各民族理性发展不均衡，因而形成不同的民族精神，而理性发展到极致的民族精神（如日耳曼民族精神）则代表世界精神。按照这种历史观，只有理性民族才有历史可言（黑格尔认为东方民族尚未进入理性时代，所以没有历史），而世界历史就是理性民族史。黑格尔哲学中聚合不同民族精神而成的“想象世界”，在历史学演绎下成为以国家为本体的“历史世界”，这就意味着，西方历史学从一诞生就不承认“整体世界”的历史，而只承认“分割为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世界”的历史。民族国家成为历史叙述的基本单位，所有人物、事件都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展开，国家之间彼此隔绝、互无联系，整体世界更无从谈起。这种“化整为零”的世界历史观凸显欧洲国家的理性先行者地位，与西方人长期以来的优越感相契合，与当时欧洲盛行的民族主义相呼应，

是一种地道的西方产品，但是伴随西方的海外扩张和“文化殖民”，其影响遍及全球。今天，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历史教育都采取本国史加外国史的模式，汤因比式的推崇民族文化纯洁性、视文化混杂为没落标志的“世界史”编纂方式在在留下痕迹，以至堆积国别、忽略整体成为世界历史叙述中的普遍现象，其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突出区别、淡化同一，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多是一个分裂乃至对立和冲突的世界。

然而，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形势的发展却与世界史学叙述的传统脉络背道而驰。国际交往空前频繁，人员、商品、资本空前流动，国际组织、跨国组织空前活跃，现代化过程固有的规律限制了文化孤立存在和自我维护的机会，而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科技发展简化了文化互动过程，静态的文明差异逐渐淡化，全球化趋势有目共睹。人们正是在对当代特点的思考和对现实世界的解释中，产生了对传统世界历史观的怀疑。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提出交往理论。他认为，人们的交往能力如同生产能力一样，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实践知识、交往行动和用共识调解行为冲突的领域中，也存在着学习过程。……而且，只有这些学习过程才可能使新的生产力得到使用”。我国学者费孝通不失时机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使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观念具有了不同凡响的现代内涵。在国际史学界，布罗代尔、巴勒克拉夫、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或呼吁或力行，以宏观视野审视世界史，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各部之和加以考察，所谓“全球史观”一时蔚然成风。全球史观内容繁复，“互动说”是其核心理念之一。该学说认为，人类属于为了生存不得不相互依存的物种，而他们为获得地球有限的能量必然彼此竞争，因此各人类群体不得不认真体会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对合作与竞争理解最深入者通常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生存繁衍机会，与他人、他者、他方共处与交流能力是导致人类整体成功生存与繁衍的力量；在有文字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推动历史变化的车轮是陌生人之间的接触，因为这种接触引起双方重新思考，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令其改变原有的行为方式，最初正是这类接触和反应导致文明的产生，此后文明之间或国际势力之间的互动乃是促成世界历史从文明的原初状态向当今状态演变的动力和基础，因此可以说，“世界历史的发展主要应归功于各文明、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作用”。“互动说”容有不周之处，但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这种视角来审视世界历史，或许会带来新

的启发。

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04年。十余年来我们除译介全球史论著外，也尝试做些研究工作。2008年在前期研究基础上，该中心获得教育部资助，承担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研究”重大攻关课题。本套丛书就是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在我们申请这个课题的时候，就有专家问我们：你们怎么解释世界历史上的冲突？强调“共生”是否掩盖了国际冲突？我们承认世界历史上冲突不断，并无掩盖之想。我们也不相信互联网理想主义者尼葛洛·庞蒂所说的，“互联网的普及将改变我们的国别概念，国家会像个樟脑丸从固体直接转为气体那样蒸发掉”，而对于当前国际上有关淡化民族利益的政治图谋，我们也保持足够的警惕。我们这些研究在重现历史上曾经发生却在世界历史学中被忽略的和平共处现象的同时，并不回避冲突，只是把冲突放在不同族群、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相遇、碰撞、交往、交流、互动、共处、互容、相融等诸多方面中间来呈现，避免唯冲突论。

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全球公民”如何相处是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文明冲突论”所引发的反响与争议事实上已远远超出作者亨廷顿原书涉及的内容。如何认识所谓“全球社会”才是关键所在，杜维明先生说，当前，“从政治上和伦理上说，世界民族大家庭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才能超越出自我利益辞藻之上，重获世界相互依靠的精神”。我国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已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美好愿景。本套丛书倘能使读者对世界的同一性和世界各部分之间的关联性增加一点儿认识，我们就很满足了。

前 言

“全球史”从广义来说是一种历史研究及历史书写的新视角、新方法，从整体观和联系观来编纂宏观世界史或考察微观个案，或者以超越民族国家的视野来看待一些跨国历史现象，是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历史学“全球转向”的产物。但是，在欧美国家，它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研究领域和历史学分支学科。因为欧美国家此前对外国史的研究，大多放在各种“区域研究”当中，民族国家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单位。但是，20世纪下半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一体化的历史进程逐渐纳入欧美史学家的视野，于是，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历史现象或大范围历史进程日益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重要主题，但对这种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历史研究，很难置于原有的民族国家史学和相关“区域研究”的学科框架之下。这样从20世纪90年代起，首先在美国，以研究跨国历史现象为主要对象的全球史便作为一个新兴历史学分支学科出现了。然而，他们在设立研究生培养项目和发展这个历史学分支学科时，大多数学校并没有用“全球史”作为这个专业的名称，而是用了“世界史”，因为他们过去原本就没有“世界史”这个专业或学科。因此，在欧美国家，以研究跨国国家、跨民族、跨文化的历史现象为特征的全球史，便用了“世界史”这个专业或学科之名。这也是欧美许多学者经常把“全球史”和“世界史”等同起来或概念互用的主要原因。

然而，在中国，这两个概念是不能混用的，它们之间应该而且也必须区分开来。因为中国已有一个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史”学科。只不过这个“世界史”以国别史和地区史为主要研究对象，顺便捎带上以国别史为本位的国际关系史、经济文化交流史等，并且把中国史排除在外，因此它与欧美的“世界史”（全球史）内涵大为不同。从这一角度来说，借鉴欧美“世界史”（全球史）新的内涵、理论和方法来发展中国的

“世界史”是必要的，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史学全球转向的必然。因此，如果在中国将全球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和历史学分支学科，置于“世界史”这个一级学科下来发展，可以丰富我们已有的“世界史”，弥补其中的不足，从而推动中国世界史研究和学科的发展。

近年来，作为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的全球史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尤其在美国史学界，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来反思欧洲中心论和重新理解东西方关系，由此出现了对世界历史进程及其发展动因的不同理论阐释，形成了几个全球史理论流派。威廉·麦克尼尔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杰里·本特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跨文化互动理论，因此麦克尼尔和本特利都将欧洲置于文明互动或跨文化互动的世界性网络中来理解，由此否定欧洲内在优越性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因。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运用中心、半边缘、边缘等概念工具来分析大范围的经济分工及其不平等关系，批评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造成了广大非西方国家的欠发达。阿布·卢格霍德则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作了延伸，提出13世纪时便在全世界存在多个区域性经济体系，欧洲只是其中之一。菲利普·柯丁从比较英帝国在大西洋两岸的殖民地社会和大西洋奴隶贸易入手，将大西洋两岸的历史联结成为一个整体，开启了大西洋史的研究，之后大西洋区域成为史学家们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并与随后发展起来的印度洋及其他海洋区域研究，形成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海洋区域史。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则从生态环境视角来理解欧洲扩张及其兴起，强调欧洲移民到达美洲和大洋洲适于生存的环境，并通过物种交流和疾病传播强化了其生存条件，这是欧洲海外扩张成功的重要原因，并由此影响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以彭慕兰、王国斌、贡德·弗兰克等人为代表的加州学派，运用比较的方法提出，19世纪之前欧洲社会在各个方面都没有获得超越中国、印度、奥斯曼帝国等东方国家的优势，但由于偶然的发展机遇推动了其19世纪的工业化，因此欧洲工业化和欧洲的兴起是偶然机遇带来的意外结果，而不是由于其内部具有某种优越性。

全球史研究中的多元性探索实践造成了不同流派及同一流派内部中的学术争鸣，但是，无论哪一流派，或者说全球史无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还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从跨国和互动的视野来审视历史是其共有特征。因此，不同文明或文化之间、不同国家或社会之间的互动，成了全球史研究

中的一条主线，而这种互动也被视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因之一。

世界历史上的文明互动是一个宏大的主题，涵盖不同文明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生态等各个领域中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有和平交流，也有暴力冲突，有平等交往，也有权力支配下的不平等互动。而且，“文明”观念本身也是在不同民族之间的互动中发展起来和传播开来的。本书所涉及的文明互动，远不及这些互动中的冰山一角，仅是笔者近年来从全球史理论出发对文明互动所做的一点初步思考。

文明问题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因此对于文明互动的研究也涉及多个学科。就历史上的文明互动而言，历史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学者都进行过探讨，但至今为止，大多数学者都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来思考文明互动，即把“文明”当作一种社会文化实体，“文明互动”主要指不同社会文化实体之间的互动。然而，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文明”作为一种话语曾对世界产生过很大影响，并继续在现实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因此国际政治学中的少数学者，开始从话语和观念的视角来看文明互动，这为我们探讨历史上的文明互动提供了新思路。因此，笔者认为，目前学术界中对“文明”问题的探讨，至少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和路径：一是把“文明”当作一种社会文化实体来研究，如古希腊文明、古埃及文明等，尽管当时的希腊和埃及还没有现代社会所使用的“文明”概念，因此这种研究是用论述者的“文明”概念套在古希腊社会和古埃及社会上，然后对这个社会文化实体进行研究，“文明”成了论述者披在某个社会上的外衣，文明互动也就成了贴着“文明”标签的社会文化实体之间的互动。这是一种广义的“文明”研究，文明史自其出现以来便是这种路径的研究，至今大多数文明研究的论著仍然沿袭了这一传统。另一条路径是把“文明”当作一种话语来研究，属于思想观念史的范畴。在这种研究中，“文明”不再是一种社会文化实体，而是当时人们的观念，这种研究从诺伯特·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初显端倪，后来在福柯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一种文明研究的新视角，社会学界的科林斯（Randall Collins）和国际政治学界的杰克逊（Patrick Thaddeus Jackson）对此作出了有益的尝试。这是一种狭义的“文明”研究，论述者所用的“文明”是研究对象而非作者本人的“文明”概念。从这一角度来说，“文明史”便应该在有了“文明”这个概念之后才有这种历史。因此，从这一路径探讨文明互动史，应主要从思想观念的层面考察历史上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在“文

明”话语中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本身对“文明”观念（话语）建构的影响。本书第11—14章便是从这一研究路径和全球史的互动观出发所做的一种初步尝试。

中文“文明”和英文“civilization”在19世纪中叶之前是一对近义词，虽然“civilization”的含义比中国传统的“文明”含义要广，它可以用复数形式表示具有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社会，但这两个词汇最初都表示一种具有良好修养的道德和行为，同时也指具有这种道德教化的社会状态，以别于没有教养的粗野行为与社会状态。因此，“修养”、“教化”是“文明”和“civilization”两个词汇在对译之前共享的内核，而且这两个概念最初的使用，都反映了一个社会群体或族群在与“他者”互动中形成的对自身行为及其社会发展水平的一种认知和文化认同，与“蒙昧”、“野蛮”相对应，因此这两个概念都打上了文化自我中心主义的烙印。只不过，烙印的深浅程度在中国和西方大为不同。源于先秦中原地区的“文明”观念，在后来华夏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中，以其“德治教化”内涵造就了一个相对和谐的东亚国际秩序。然而，本来就以基督教伦理为基础的“civilization”观念，在19世纪又被赋予了“自由”和“进步”等价值观的内涵，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非西方国家，发展成为西方国家运用于国际政治的一套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服务于西方的殖民扩张和霸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civilization”概念及其观念随着西方文化扩张而传播到日本和中国，“civilization”也由此译成了中文的“文明”。这样，中国的“文明”观念在晚清出现了嬗变。中国在19世纪末接受西方的“文明”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中断了中国固有的现代性追寻，其他非西方国家也遭遇了类似中国的经历，这种西方霸权下的“西方化”无疑阻碍了现代世界多元现代性的形成。

文明互动是多维度的，生态领域的互动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互动而带来的物种交流和疾病传播，近年来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本书的第16—19章便从理论到实证对这种互动作了初步探讨。克罗斯比是从生态视角来理解和解释欧洲扩张的开拓者，从物种交流和疾病传播来解读欧洲扩张中发生的跨文化互动，以及这种互动所带来的世界性后果。他把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新旧大陆之间的物种和病菌传播称为“哥伦布交流”（Columbian Exchange），这一表述由此成为描述这类现象的一个特定概念。哥伦布时代的欧洲人把天花带到美洲，造成了大量印第安人的死亡，加速

了欧洲殖民者对美洲的征服，最终促使了大量欧洲移民和非洲奴隶来到美洲，从而改变了美洲的种族成分、文化和社会经济，尤其是在美洲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种植园经济——一种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如果说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多少与“始作俑者”天花有关，那么，1918—1919年的大流感，则借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殖民网络造成了一场世界历史上名副其实的“多米诺效应”。1918年春天，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一场流感从美国爆发后很快席卷全世界，一直持续到1919年夏天才基本结束。这场流感在全球造成死亡的人数，保守估计有2100万，也有人估计高达1亿，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场上死亡的人数。正是它的巨大破坏性，造成了地处西非的英国殖民地尼日利亚大量青壮年人口的死亡，使得尼日利亚人不得不放弃传统的粮食作物薯蓣而大面积改种劳动耗费较少的木薯，从此，尼日利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木薯生产国。因此，在流感传播、世界大战和殖民网络体系中，尼日利亚的木薯种植具有了“全球性”的历史内涵，致使其具有这种内涵的互动链条是：首先发生于美国的流感，通过美军赴欧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将流感病毒带到了西欧，法、英、德等国军队很快染上流感。而塞拉利昂、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当时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和保护领，与英国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肆虐于欧洲的流感也迅速随英军传播到了这里。结果，流感造成尼日利亚大量青壮年人口死亡和粮食短缺，使得尼日利亚人不得不改种木薯来维持生存。这样，流感病毒借助于世界大战和殖民网络体系，从美国、西欧传播到了尼日利亚，最终影响并改变了尼日利亚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这种“多米诺效应”式的互动和关联性，表明了全球化条件下的地方性事件（美国发生流感）有可能产生全球性影响，而地方性事件（尼日利亚木薯种植）也作为大范围互动的结果而具有“全球性”的内涵。

笔者近年来致力于全球史理论和文明互动研究，原计划从全球史理论出发对文明互动做一个较为完整的阐述，但由于时间和精力限制，只好将一些已发表的相关论文稍作修改，并增加部分章节整理成这本书。因此，其中不足之处，还请方家教正。

目 录

| | |
|-----------|-----|
| 前 言 | (1) |
|-----------|-----|

上编:全球史理论

| | |
|-----------------------------------|-------|
| 第一章 “全球史”与“世界史”的关系:“全球史”是什么 | (3) |
| 第二章 20 世纪以前欧洲的普世史理论 | (13) |
| 第三章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 (34) |
| 第四章 美国的西方文明史和宏观世界史教学 | (48) |
| 第五章 全球史在美国的兴起及其多元性 | (60) |
| 第六章 《人类之网》:全球史建构的网络化想象 | (82) |
| 第七章 本特利的“新世界史”与“跨文化互动” | (90) |
| 第八章 马兹利什的“新全球史”探索 | (102) |

中编:文明互动和“文明”观念

| | |
|-------------------------------------|-------|
| 第九章 多元文明与文明互动的历史书写 | (115) |
| 第十章 社会学视野中的符号互动与文明际相遇 | (136) |
| 第十一章 18—19 世纪欧洲的“文明”观念和“文明”话语 | (152) |
| 第十二章 19 世纪末欧洲国际法中的“文明”标准 | (170) |
| 第十三章 中国传统的“文明”概念及其在晚清的嬗变 | (188) |
| 第十四章 欧洲“文明”观念的传播:基佐、福泽谕吉和梁启超 | (208) |
| 第十五章 西方模式与社会发展:全球史视野下的反思 | (227) |

下编：全球和互动视角的疾病传播

| | | |
|------|---------------------------|-------|
| 第十六章 | 克罗斯比与生态视角下的欧洲扩张 | (241) |
| 第十七章 | 全球史视野中的传染病研究 | (254) |
| 第十八章 | 1918 年大流感的起源及其全球性传播 | (266) |
| 第十九章 | 大流感、殖民体系与尼日利亚木薯种植 | (281) |
| 参考文献 | | (294) |

上 编

全球史理论

第一章

“全球史”与“世界史”的关系： “全球史”是什么

全球史从广义来说是对近年来历史学“全球转向”中形成的一些治史实践、观念、视角和方法的总称，从狭义来说是指正在形成中的一门以跨国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历史学分支学科。但无论作为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全球史，还是作为研究领域的全球史，它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历史学对全球化浪潮的一种反应。它于20世纪下半叶首先兴起于美国，然后扩展到世界各国，在当今中国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狭义的“全球史”与“世界史”是什么关系？它是否等同于“世界通史”？“全球史”研究是否具有可操作性？中国在已有“世界史”框架下如何发展“全球史”？这些问题是中国学者在理解和研究全球史时会遇到的基本问题。笔者在此主要对作为分支学科的狭义“全球史”作一简要概述与探讨，希望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

一 “全球史”与“世界史”的概念及关系

要理解“全球史”与“世界史”之间的关系，还得从欧美与中国的史学及学科传统谈起，并把这个问题置于中美不同的学科语境中来理解。

欧洲自中世纪基督教史学产生起，就在创世神话和线性时间观的影响下，形成了宏观人类史的编纂传统。17世纪以后，以欧洲为中心的“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世界史”（world history）、“通史”（general history）等宏观世界史著作就一直贯穿于西方史学之中。然而，到19世纪中叶，随着职业历史学的产生，欧洲史学开始依赖于档案资料和局限于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史由此兴盛起来，带有宏大叙事性质的普世史被冷落。到20世纪上半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的《历史研